

《长日将尽》中的日本性书写

李凡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兰州, 中国

【摘要】《长日将尽》是日籍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探讨记忆、尊严与自我欺骗的经典作品,但其主人公史蒂文斯的职业精神与情感压抑亦折射出深刻的“日本性”的特征。本文从日本文化中的真实情感与表面规范的二元对立切入,分析史蒂文斯如何通过极端克己与情感压抑维系职业尊严,其行为逻辑与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忠”、“克己”高度契合。同时,小说中管家职业的仪式化与完美主义追求,呼应了日本社会对职业精神的极致推崇。此外,史蒂文斯对往事的不可靠叙述,揭示了其与日本战后集体记忆重构相似的逃避机制。通过对比日本文化中的情感表达范式与社会规范,本文认为,《长日将尽》虽以英国庄园为背景,却在人物塑造与主题层面隐含着石黑一雄对日本文化内核的跨文化书写,展现了压抑情感与恪守职责之间的悲剧性张力。

【关键词】《长日将尽》; 石黑一雄; 日本性; 职业精神; 情感压抑

1. 引言

《长日将尽》是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一位英国贵族管家史蒂文斯的六日西行之旅为主线,叙述了其一生的管家生活。史蒂文斯始终追寻管家“尊严”,多次置亲情爱情于不顾,而其盲目效忠的勋爵也因亲纳粹立场而身败名裂。旅途终点,肯顿小姐坦言曾幻想与他共度一生,但早已时过境迁。暮色中,史蒂文斯首次承认“心碎”,却仍用职业信条进行自我安慰……

作为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作品始终游走在东西方文化的交界地带。尽管他五岁便移居英国,并一直以英语写作,但其创作内核却深深根植于日本的美学传统与文化精神,这种独特的文化杂糅性使其作品呈现出深刻的“日本性”。尽管《长日将尽》题材上一改传统写作风格,背景设定在英国,情节上不再与日本有关,却隐晦而精妙地呈现了主人公史蒂文斯身上的日本特质,文本也在最具英国性的叙事中完成了最深刻的日本性表达。

2. 情感压抑与克己

在《长日将尽》中,很多描写都体现出了史蒂文斯的情感压抑,而这一现象呼应了日本传统中的“本音”(真实情感)与“建前”(表面行为)的分裂。在日本文化中,人们交流常常会用到“本音”、“建前”两种策略。“本音”就是“真正的声音”;“建前”就是“表面的方针”^[1]。日本人多把表面的方针

放在优先地位,而往往隐藏真实的声音。根据日本学者荒木博之^[2]所说,日本人常按“建前”而行动,而常常压抑“本音”,即内心真实的想法与声音。日本文化中的“克己”强调通过压抑私人情感来达成更高的目的。史蒂文斯的克制呈现出日本特有的“建前”与“本音”的二元对立。他精心维持着完美管家的“建前”,却早已经在内心掀起情感的狂风暴雨。

史蒂文斯在面对亲密关系时选择了压抑自我。在每当肯顿小姐试图拉近关系时,史蒂文斯总是将话题转向工作,避免情感暴露。肯顿小姐发现史蒂文斯在读浪漫小说时,史蒂文斯立刻慌乱解释到“这只是为了提高词汇量”^[3],在肯顿小姐站在其门外试图寻求安慰时史蒂文斯只是生硬地说“肯顿小姐,你这样会影响工作效率。”^[3]在多年以后的重逢中,史蒂文斯终于承认“我的心碎了。”但随即又安慰自己“但至少我没有辜负自己的职业”^[3]。同样,在其父亲弥留之际,史蒂文斯依然选择继续服务晚宴,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伟大的管家的标志”,认为情感外露是失职。在得知父亲去世之后,依然选择工作,因为“一位伟大的管家绝不会因私事影响职责”,“尊严不在于表达情感而在于压抑情感”^[3],他甚至还为自己能完美控制情绪而感到自豪。这种表达方式类似于“建前”(表面礼节)与“本音”(真实想法)的分离——他无法直面自己的情感,只能用职业化的外壳来掩饰内心的渴望。像许多恪守传统

的人一样，史蒂文斯视压抑为美德，却最终发现这种克己使自己成为信仰的囚徒。当他晚年回顾过去时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亲情、爱情，甚至是对雇主达林顿勋爵的道德判断。在小说的结尾史蒂文斯坐在海边长椅上，终于允许自己流出一丝遗憾：“也许，我确实浪费了自己的人生。”^[3]这一瞬间的脆弱，揭示了其一生克制的荒诞性。

3. “职业精神”与武士道

管家是英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就其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而言，管家与日本的武士阶层相差无几。在文本中，由史蒂文斯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

管家和武士都极为强调“忠诚”。史蒂文斯为达林顿府奉献了其宝贵的三十五年青春，并且认为“这种素养是业内人士之本质特征”^[3]。为了完美履行其管家职责，史蒂文斯忽略了弥留之际的父亲和对其有好感的肯顿小姐，甚至认为被人羞辱替主人解围是证明其能力的事。在古代日本，武士对主人的忠心被认为“是各种德行中最宝贵的一种”、“有着至高无上的重要性”^[4]。管家和武士都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只能靠受聘为生，因此主人的青睐格外重要。这种所谓的“职业精神”和“武士道精神”使得雇主的地位尤其重要，由此管家与武士对主人的命令无条件服从，对主人的关心更甚于自己，时间一久便难免丧失思考能力，进而极有可能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与自我。

除此之外，管家和武士都格外看重“尊严”。虽然在身份上有着等级的差别，但在长久的服务于“绅士”活动之中，管家也向着“绅士”的举止发展。于史蒂文斯而言，服务于达林顿勋爵，便有了“与其他颇具影响力的伟大人物和伟大领袖结识”^[3]的机会，并可以通过服务这些决定世界命运的大人物来服务整个世界，这是对其“重要地位的肯定，而其地位外在表现为‘尊严’”^[3]。在他看来，“尊严”是评判杰出男管家的核心准则，而维护尊严的真谛则在全身心投入角色。他一方面将父亲及其他优秀管家作为自身楷模，将职业使命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同时又带着某种优越感看待普通人。这种心态与日本武士阶级颇为相似——日本武士阶级同样看重自己“最有男子气概和最富冒险精神”^[4]的出身，重视其“佩刀的特权和其所象征的荣誉，在标榜义、仁、勇等规诫的同时，与平

民阶层竖起了森严的壁垒。”^[5]这与史蒂文斯的心态与行为及其相似。在“职业精神”的束缚下，在虚荣与自负的膨胀中，两者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局限，与外界世界也愈发疏远。

4. 不可靠叙述与战后集体记忆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指出，“经验性的记忆与叙事性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断裂关系。在历史充满征服色彩的强大推力之下，记忆被连根拔起……如果我们仍身处于我们的记忆之中，可能我们尚不需要承载记忆的场，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场，历史就会被记忆裹挟而去。”^[6]《长日将尽》表面上是英国管家史蒂文斯对其职业生涯的回忆，实则也揭示了记忆如何被精心修饰与重构的复杂过程。这种叙述策略与战后日本对战争记忆的处理方式出奇一致，二者都呈现出记忆的选择、逃避与美化特征。因此他认为“历史不能等同于记忆，前者是来自官方的书写，而后者则是属于个人鲜活的经验”。^[7]

作为为达林顿府服务三十余年的管家，史蒂文斯的记忆充满了其对过去辉煌的沉湎以及追思。达林顿府昔日的荣光在史蒂文斯的叙述中不断被美化、重构，实则是借达林顿府缅怀某种符号化的荣耀。史蒂文斯的叙述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自我欺骗仪式。史蒂文斯的一生几乎都与达林顿府捆绑在了一起，其所追求的社会地位也只依赖于府邸的地位，因此，达林顿府在史蒂文斯心里已经抽象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符号。因此，他坚称达林顿勋爵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却有意忽略其与纳粹的亲密关系，不愿面对其信仰将被解构的危机，因为一旦承认，便“意味着达林顿勋爵不再是一位‘伟大的绅士’，自己也就不再是为‘伟大绅士’服务的‘伟大管家’”^[8]；他自豪于自己职业的“尊严”，却回避这种尊严如何服务于不道德的事业这种叙述的不可靠性不在于记忆，而在于有选择的遗忘和重构。此外，史蒂文斯在叙述中钟爱于一些表示肯定的语言并且过分强调，而这种强调暴露了其不确定与不自信。类似的，日本因战争而获得所谓的荣耀与尊严，却又在战后面临着地位一落千丈的窘境。战后日本的官方叙事长期强调广岛、长崎的受害者身份，却模糊了作为侵略者的角色；突出经济复兴的奇迹，却淡化战绩责任的讨论。这种记忆的双重标准并非日本独有，却是其集体记忆建构中尤为突出的特征。但是，由于极力隐瞒，因此记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

漏洞，并且由于“记忆之场存在着公共性与集体性，有其他个体作为记忆的参照物存在，某个个体试图通过封闭与固化记忆之场所呈现出来的假象总是苍白无力的，这种偏离性叙述必然难以长久维持”^[7]。

石黑一雄通过史蒂文斯渐进的自我觉醒，暗示了面对真实记忆的痛苦与必要。在小说的结尾，当史蒂文斯承认“我把整个生命都浪费了”的时刻，正是他开始面对真实的时刻。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史蒂文斯的叙述由达林顿府转向了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尽管达林顿勋爵的努力已经证明是被误导的结果，甚至是有些愚蠢的，但是我又为什么要认定自己也需要为此付出责任呢？”^[3]对于日本而言，类似的“觉醒”过程更为复杂。这种黄昏的顿悟对应于日本社会近年来对历史问题的部分直面。石黑一雄没有让史蒂文斯打破幻想，而在保持基本叙事框架的同时，允许真情实感的渗入。这种处理暗示着集体记忆重构的现实路径：非全盘否定或彻底坦白，而在现有叙事中寻找容纳真相的缝隙。

5. 结语

《长日将尽》虽以英国贵族管家史蒂文斯的一生为主线，但其精神内核却与日本文化中的情感压抑、职业伦理及身份认同形成深刻互文。通过分析“本音”与“建前”的冲突、武士道精神的投射、职业仪式化的“职人气质”以及不可靠回忆叙述，本文揭示了石黑一雄如何在其跨文化叙事中隐伏“日本性”的书写。史蒂文斯对情感的极端压制、对职责的病态恪守，以及通过不可靠叙述完成的自我欺骗，均折射出日本传统与现代性交织下的文化困境——一个个体在集体规范与真实自我之间的撕裂。这种书写不仅是作家日

英双重文化背景的潜意识流露，更提供了一种解读战后东亚社会普遍存在的记忆重构与身份焦虑的视角。最终，小说以史蒂文斯的悲剧性觉醒，隐喻了文化枷锁下人性的普遍挣扎：当“尊严”沦为自我否定的工具，克己的崇高性亦在虚无中崩塌。史蒂文斯的终极困境——无法面对真实的自我，这既是日本式“耻感”的产物，也是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这种普世性正是石黑一雄对“日本性”的创造性转化

参考文献

- [1] 陈丽. 小议日本人交际中的“本音”和“建前”[J].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3, (01): 245+249.
- [2] 荒木博之. 日本人的行动样式[M]. 东京: 讲谈社现代新书, 1973.
- [3] 石黑一雄. 长日将尽[M]. 冯涛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19.
- [4] 新渡户稻造. 武士道[J]. 日本四书, 曹立新译, 2006: 232、208.
- [5] 姜清远, 申富英. 硬币的另一面——浅析石黑一雄小说《长日留痕》的管家形象及其意义[J].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15(2): 83.
- [6] 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社会文化史[M]. 黄艳红等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7] 徐笑盈. 石黑一雄作品中的记忆之场研究——以《我辈孤雏》《浮世画家》《长日将尽》为例[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1.
- [8] 陈程. 论《长日将尽》中的回忆叙事策略[J]. 文学教育: 上, 2017(12): 24-25.